

○当代新诗话 主编 沈奇

断无不可解之理

○赵毅衡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西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断无不可解之理

赵毅衡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 西安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断无不可解之理 / 赵毅衡著. —西安:陕西人民
教育出版社, 2015. 5
(当代新诗话 / 沈奇主编)
ISBN 978-7-5450-3646-6

I. ①断… II. ①赵… III. ①诗歌评论—中国—当代
—文集 IV. ①I207. 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1786 号

DUAN WU BU KE JIE ZHI LI

断无不可解之理

赵毅衡 著

出 版 人 黄平利
策 划 田和平 马晓侠
责任编辑 赵小林
责任校对 李怡萱
装帧设计 沈 斌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西安市丈八五路 58 号 邮编:710077)
印 刷 中煤地西安地图制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3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0-3646-6
定 价 30.00 元

意义的悬搁与解读的可能

——读赵毅衡《断无不可解之理》感言

西方神话中有一段漂亮的公案，在亚里士多德也着迷的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也有过记述：狮身人面的怪兽斯芬克斯好容易想出个谜，难倒了每一个过路的人，直等遇见英雄的少年俄狄浦斯才得到了谜底。现在读来，谜语本身似已无迷人之处，倒是解谜的过程和结果大有意味：这个并不难猜中的谜，何以当时天下人皆不知其谜底；出谜者斯芬克斯为何终未引俄狄浦斯为知己，从此做一对好谜友，反倒投崖以自绝于世。

将其理解为斯芬克斯有美貌更有坏脾气，未免小儿科；是否喻示人无法认识自己，又高深得只能留给哲学去对付。即兴而思，想来无论做何解都与这两点脱不了关系：谜，只能在解谜中才能靠近；但谁敢肯定地给出唯一答案，谁也就伤害了出谜者和谜语本身。

在昆明这个细雨的早晨，浮想这段爱琴海边的公案，与阅

读先生赵毅衡的诗话书稿《断无不可解之理》有关。先生是我老师，他渊博、睿智、谨严而深刻，每每听其言与读其书，都有如露入心、醍醐灌顶之感。面对这部即将付梓的诗话书稿，从初识书名之凛冽，到惊艳内容之透辟，都使得这场阅读一如既往地全程充满张力，并时时诱使我暗自忖度：先生会如何征服文学上的斯芬克斯。

“断无不可解之理”无疑是一个语气峻峭，不需要低调与留有余地的命名或称命题。以此为名的书稿，是先生在系统的叙述学、符号学体系架构之余，关于诗文本、诗文化以及诗写者的若干断续与明灭的见解。故体例上不计长短，有百来字的禅机诗话，亦有近万言的磅礴之论。如此混搭风，虽在先生著作中实属少见，却也别有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之自在。其间，他还狡黠地将“诗话”这种传统的论诗文体，扩展为更广义的诗学批评话语，所论除了诗歌，还兼及歌词、戏剧、书法、批评等各种艺术门类。如此，这个命名的不容置疑性，指向的是诗之解必然有，更是广义的艺术、文化之解必然有。

从新批评、叙述学、符号学，再到符号叙述学，先生沉浸于“形式/文化学批评”(a formal/cultural approach)三十多年。那个他得以从煤窑里攀爬出来的1978年的早春，已注定此后他与“形式论”的相遇，是契机也是必然：“十年的体力劳动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主导的文学方式和批评方式，所谓反映真相的现实主义，只是浅薄的自欺欺人主义。我贴近生活，贴得

很近,我明白没有原生形态的、本在的生活,一切都取决于意义的组织方式。”自此,从早年的《苦恼的叙述者》(1991)、《礼教下延之后:中国文化批判诸问题》(2001),到新近的《意不尽言——文学的形式-文化论》(2009)、《符号学原理与推演》(2011)、《反讽时代:形式论与文化批评》(2011)等诸多著作中,他一直坚守着“从形式探视文化”的立场,让一切隐藏在明显的、自然的、普遍的、无可争议的事物背后的事物,皆经由组织它的“形式”,被洞察与追溯。“诗话”《断无不可解之理》意欲表达的,同样是这个立场,并同样将在“形式”的洞察中完成。

可解或不可解,在于文本自身,亦在于阐释。

艺术总是不透明的,它的意义需要经由批评阅读来构筑。接受美学将其解释为语言的“召唤结构”,即由于语言作为声音象征符号系统的局限,事物和思维的属性既不可穷尽,又不能直接对应,它只能是唤醒主体经验。而先生在《艺术的秘密在于藏起秘密》中形容这个“召唤结构”为:“艺术告诉我们她有个秘密,艺术也告诉我们她藏起了这个秘密,艺术的秘密就是她不告诉我们这个秘密藏在哪里,诗就是与艺术的捉迷藏游戏。”读起来像一段绕口令文字游戏,却形象地指认了:语言之下有秘密才是艺术的本意,任何艺术的接受与阐释,都是对文本的猜测游戏。

而猜测亦有规则,需受到“形式”的制约,要在元语言集合

中完成。文本的意义从来不是先于自己而存在，也非独立地存在于自身之中，其产生和阐释，都必须依靠元语言来实现。早在《如何把韦伯切成两半——新儒家与“继发型资本主义”的伦理价值》一文中，先生已对此有过精到论述；后来的《元语言冲突与阐释漩涡》一文以及《符号学原理与推演》(2011)诸作中，他亦反复强调元语言对于文本意义生成与析取的统摄功能：只要有相应的元语言，意义的存在就已事先确定，便不可能有无意义的符号文本；既然元语言不允许一个文本没有意义，哪怕是确实不可解的文本，阐释者也能得到一个“近解”。

像这样的情况，我们的传统艺术批评将“无理”与“至妙”做相互推衍，便是一个极妙的佐证：清朝人吴乔在《围炉诗话·答万季野诗问》中提出“无理而妙”，贺贻孙又在《诗筏》中提出“妙在荒唐无理”，沈雄更在《柳塘词话》称“词家所谓无理而入妙，非深情者不办。”中国古典诗话或词话的“妙悟”式批评传统，赋予作者与利根器的批评阅读者(夏济安在《两首坏诗》中语)之间相视一笑、了然于心的权利：无理之妙，妙就妙在妙不可言不必言，而“无理”之说，不必当真。

所以，先生说“意不尽言”：“在批评性阅读之前，文本的存在待定：文本靠批评创造意义。不需要批评的文本，不是正常的文本；不需要批判的文化，不是正常的文化。但是意不尽言，因为言者之言‘特未定’，批评只能产生一种可能的意义。”

意在文本意义的解释有无限可能。

之后，先生又说“断无不可解之理”：“人类符号表意中的一个根本性悖论：不是符号文本要求相应的元语言来阐释它，而是元语言强迫符号文本产生可解的意义。”强调在阐释之前，意义是潜在的悬浮于文本之中，一旦进入阐释，便定能触摸到“意义之可能”。

而在“断无不可解之理”的定有解与“意不尽言”的无定解之间，是模糊而巨大的一团，它同时赋予阐释者巨大的主动性与无限的可能性。可以说，这是先生在遍历西方现代形式论之后，为批评阅读所寻找到的最合适的位置。

先生“最讨厌煽情”，至少少有记述自己生活的细节，我能记起的一段在《当说者被说的時候：比较叙述学导论》（1998）的“自序”中：“我记得伯克利铺满阳光的街道，通向澄蓝的海滨，傍晚时分，雾气会从海湾卷上来，沿着街上的树列向前推进，而从海里爬出来的我则开着一辆二手车，赶在翻卷的雾前面开回宿舍：从后视镜里可以看到，雾气的前锋翻着滚着，像一群猫的鬼魂，奔跑着抓我的后轮。”彼时，他正写作《当说者被说的時候》，作为这段“一生罕有的快乐经验”的伴随记忆，这段叙述同时衍散出一种快乐的紧迫感。

它常常让我想象：那在雾气的前锋之前奔跑着的后轮，其实一直隐现于先生的“形式/文化批评”实践中，使他能持续以个性化的学术心态、学术胆识和学术表达，回应时代前沿理

论的挑战,以及对这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之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无疑,《断无不可解之理》同样提供了这种“快乐的紧迫感”:在对传统诗话“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三分的回应,与对既往置解释于符号表意附属环节诸认知的颠覆中,它意图完成对广义的诗文本、诗文化以及诗写者解读之可能的探询,以及对可能之一种的表达。

而在解释的明确的结论与文本模糊不清的自身之间,“没有要表达的主题/正是要表达的目的”,从理论建构、文本批评到自身的诗歌写作,先生赵毅衡一直都是这样表达的。

孙金燕

2014年初秋于昆明

目 录

意义的悬搁与解读的可能

——读赵毅衡《断无不可解之理》感言…………… 1

I 诗的(不讲)道理……………	001
断无不可解之理……………	003
常识否定……………	007
反喻:无喻之喻……………	009
超宽幅,再度窄幅……………	012

期待成诗	015
文-物-意,不称不逮	021
没有根据!	023
刺点与诗眼	027
如何用语言克服语言障	031
三十年前读禁书	040
艺术的秘密在于藏起秘密	044
斜阳中有无限璀璨	046
禅机诗话	050

II 诗文化

批评的出发点	079
内容陷阱	081
意识形态的整体要求	083
作品必破碎	085
批评破罐子破摔	087
四百年出一次纯诗论	089

透明的批评,不透明的诗	091
批评永不朦胧	093
学院的社会角色	095
文化“三统”	097
三统轮流	099
转型期的文学	101
寻找新形式	104
文人化才是中国化	106
立功、立德、立言?	108
“全盘”只是姿态	110
 Ⅲ 中、西、中西诗人	 113
看过日落后的眼睛:读沈奇《天生丽质》	115
台北,诗的台北	120
读邱振中:艺术不是什么	128
别给我出难题,但我偏爱这些诗人	133
读陈敬容:不为男人做注脚	136

重新发现诗论家邵洵美	149
我们时代的孩子	155
一张树叶穿过历史	160
一本诗选的故事	165
地铁诗——对“中华诗歌帝国”的启示	168
大胆出诗人：读肯明斯	171
二位赖特的道家诗	176
勃莱：超现实与道德经	182
凯喆安的“机变诗”	188
卡洛琳·刘的中国哲理诗	194
阿瑟·施：绝句的意境	197
后记	199

I
诗的『不讲』道理

断无不可解之理

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何文焕在《历代诗话索考》一文中对此针锋相对地批评说：“解诗不可泥……而断无不可解之理。”“泥”就是纠缠于不可解的、表面上不通的文字，实际上各种元语言因素的效应，完全能使阐释摆脱字面意义的纠缠。元语言因素积累达到足够的压力，解释的必要性增加到一定程度，就不存在“不可解”的文本。

元语言不仅是意义实现的先决条件，元语言也是意义存在的先决条件。面对一个文本，任何阐释努力背后必须有元语言集合，这样文本才必定有意义可供阐释。文本并不具有独立的本体存在，文本面对阐释才存在。

那么，阐释者怎么知道某个文本必定有意义？怎么知道他的阐释努力必定能取得一个意义？因为阐释者总有一个元语言集合可用，而元语言集合产生的目的就是从文本中推压

出意义。此言听来似乎是因果循环,实际上却是人类符号表意中的一个根本性悖论:不是符号文本要求相应的元语言来阐释它,而是元语言强迫符号文本产生可解的意义。《诗经》中有“忧心炳炳”之类大量形容忧愁的叠字。《尔雅·释训》认为“殷殷、惇惇、忉忉、博博、钦钦、京京、忡忡、懔懔、奕奕”,都是一个意思:“忧也”。恐怕这些字都没有忧愁之意,大部分只是“忧心”的一种“拟音”。如果要问无忧愁意义的词如何能表现“忧心”?原因很简单,文中已经指出了它们用来表达“忧心”,上下文的压力,迫使它们不可能有别的意义。

同样,“香稻啄余鹦鹉粒”为什么必须是通顺的诗句?因为诗歌解释的元语言迫使其混乱的词序重构到可理解的程度。钱钟书讨论《诗经》,“不通欠顺……在诗词中熟见习闻,安焉若素,此无他,笔、舌、韵、散之‘语法程度’(degree of grammaticalness),各自不同”。而钱先生此语的出典,是符号学家西比奥克。

乔姆斯基在 1957 年造出来挑战语法概率论模式的句子“无色的绿思狂暴地沉睡”究竟为什么有意义?赵元任在他的名文《从胡说中寻找意义》中证明,在释义压力下它必须有意义,不然信息无法完成表意过程。《爱丽丝奇遇记》中爱丽丝在国王房间中发现的那首胡诌诗(“‘Twas brillig, and the slithy toves……”)整篇音韵铿锵煞有介事,却无一有意义的词,批评家 R. P. 布莱克穆尔盛赞此诗是“艺术中成为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整个运动的先驱”。托多洛夫也强调说:“自创语言永远是有理据的,自创词语者的新词,或是语言的,或是反语言的,但永远不会是非语言的。”